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连 辑

副 主 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 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 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 划：马永强 王正茂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和纵深。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传

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以其彩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约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氏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

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永靖恐龙足印群与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

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源圣地”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形象代表——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读者。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周先祖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

边关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会宁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石头的重量
001	《西狭颂》 ——东汉摩崖刻石之冠
012	《南石窟寺之碑》 ——南石窟寺的由来
021	《大代持节幽州刺史山公寺碑颂》 ——奇特的北魏孝文帝功颂碑
032	《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 ——大唐首位和亲公主的凄美故事
039	《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 ——吐谷浑王族的辉煌与无奈
047	《哥舒翰纪功碑》 ——哥舒翰建功西北的珍贵记忆
055	《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 ——难解的李将军身份之谜
063	《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 ——“诗窖”的丰碑

074	《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 ——唐宋时期道教兴盛的遗存
087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 ——一块用了 56 年完成的石碑
096	《新修白水路记》 ——宋代交通邮驿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03	《世功保蜀忠德之碑》 ——“褪色”的石碑
109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 ——一个神秘王朝的传奇故事
123	《镇海之碑》 ——石碑上的圣旨
130	《敕赐雍古氏家庙碑》 ——元代名门望族的辉煌家史
143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高昌回鹘的辉煌史诗
156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的印记
163	《大元敕赐西宁王碑》 ——回鹘东迁后的忻都家族史
172	《御制大崇教寺之碑》 ——岷山高拱法王宫
180	《肃府本淳化阁帖》 ——保存完好的中国书法“丛帖始祖”
193	《重修白塔碑记》 ——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
202	附：甘肃著名碑刻补录
210	主要参考文献

石头的重量

以前，人们将竖立起来作为纪念物的石头，叫做碑，在上面镌刻上文字，称之为碑刻。

中国碑刻的历史很久远，据专家考证，真正的碑刻始创于秦代。从那时起，很多地方就利用碑刻的方式来记录资料，保存历史，缅怀先人。从帝王将相的记功碑，到重大宗教活动的记事碑、名门望族的家庙家训碑、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神道碑，再到文人墨客的翰墨石刻，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碑刻文化一直怀有浓厚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和对一系列人文主题的关怀，催生了碑刻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

甘肃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汇聚相处、各种宗教信仰共生并存、多种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地方。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存。在这些文化遗产中，碑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比如，敦煌莫高窟的《六字真言碣》，在

同一块碑上用六种文字刊刻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让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流共存；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一块西夏文碑刻，它奇特的经历，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的领地，捡起了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记忆；泾川的《镇海之碑》是一块全国罕见的八思巴文石刻，它让我们在唤醒已经死亡文字的同时，感知了泾州这个地方曾经是如何的重要和繁盛；汉文、回鹘文合璧的《高昌王碑》讲述了元代高昌回鹘东迁的历史，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同时，发现河西这片土地曾经的水草丰茂；从岷县汉文与藏文分立的《大崇教寺碑》中我们发现，这里在元明时期竟然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且盛极一时。甘肃这片土地上的石刻遗存，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厚重的文化积淀。

碑刻，作为一个重要载体，在中国书法艺术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碑不同的还有山体上的摩崖、呈不规则状的碣石等，对此，一般称之为刻石。在甘肃的刻石中，镌刻于1800多年前的成县《西狭颂》摩崖保存之好，艺术价值之高，令人称奇，它被誉为“汉摩崖石刻之冠”；现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石刻，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大型书法经典；泾川的《南石窟寺碑》、宁县近年发现的《大代碑》，其艺术价值足可与《龙门二十品》媲美。还有，黄庭坚、赵孟頫、康里巎巎、文征明、沈粲等历代书法大家均有书迹在这里留存，他们与范仲淹、李昉、虞集等历代文坛巨擘一起，共同构筑了一道奇特而瑰丽的刻石文化风景。

碑刻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书法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艺术和学术两个研究分支逐渐分流，且渐行渐远，甚至完全割裂。从事书法的人只关注碑刻的书法艺术，全然不顾其文化内涵；学者作家只注重其史料价值或文学价值，往

往忽略了其书法审美。这就让我想起了古代文人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把碑刻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其学术价值，甚至出于文人的偏好，他们大多将目光集中于后者。如果我们回到古代文人的视野，或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碑刻的艺术性和学术性，它们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

本书的作者刘森，是一位年轻的资深报人，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我眼里的这位报人同行，像一支毛笔，总是挺直了腰板在报社的大楼上上下下。这倒很符合他书法家的形象。我见过他的书法，清瘦、骨干、有力道，笔锋落在纸上，就像刀刻在木石之上，足见他的功力深厚。若和他谈起书法，他三言两语，都说到点子上。慢慢地感觉到，他清秀的外表下，还藏着深深的内秀。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著，让我心生感动，在这么一个浮躁的风气下，一个人能如此静下心来，从文化中汲取营养，修身养性，真不容易。和他交往多了，便感觉他骨子里有一种古代名士的情结，淡泊却孤傲。有时，我感觉他很像一根竹子，无论气质和形象，都像。我想他若画竹也一定是个高手。当然，基于对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目光长期穿梭在碑、帖、宣纸和古籍之间，这不仅使他感到了那些刻石上的汉字的精美，同时也感受到了它们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厚重。适逢甘肃创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由他来执笔撰写一本介绍甘肃历史刻石的书，真是事逢其人。这本书告诉我们：对待刻石这一独特的文化遗存，不仅要欣赏它们的书法艺术，还应了解这些金石文献的学术价值，品味它们的文学趣味，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独特的刻石文化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甘肃的碑刻在浩瀚的中国碑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甘肃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每一块碑后面都站着一个人，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块碑都是一本大书。把这些碑汇集到一本书中，是需要文化来支撑的，也是需要付出心血的。

好在刘森乐于干这个差事。

读了这本书，我是喜欢的，书中有对历史的介绍、人物的评价和艺术的鉴赏，而且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我从中增长了见识。我相信对甘肃的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也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是为序。

牛庆国

2014年3月

《西狭颂》 ——东汉摩崖刻石之冠

自古以来，由于西秦岭横亘在陕西、甘肃与四川之间，重峦叠嶂，成为阻隔陇蜀的天然屏障，道路艰险异常，行人视作畏途。于是，就有了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绝唱。

早在汉代或者更远，先民们就有了改造蜀道的想法。他们在高山峡谷之间，依山傍水，修建栈道，以为通途。每次修好一段路后，人们都要在修建的道路旁选择一方平整的石崖刻石记事，或纪念道路的修通，或颂扬主持修路的人的功绩。

千百年来，在穿越秦巴大山的每条古道上几乎都留下了大量的石刻。如陕西汉中褒斜道上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南端谷口的《石门颂》，略阳县嘉陵江畔的《郾阁颂》，甘肃成县鱼窍峡中的《西狭颂》《耿勋碑》等等，由于这些刻石在史料、金石、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备受历代学人推崇，被誉之为“蜀道瑰宝”。

在这些刻石中，有三方镌刻于1800年前的摩崖功德石刻尤为珍贵，它们分别是《石门颂》《西狭颂》和《郾阁颂》，被人们并称为“汉三颂”，有“东汉书法艺术三玉”之誉。

目前,《石门颂》已从崖壁上凿出移至汉中博物馆,《郾阁颂》因修路而凿迁至略阳灵岩寺,唯独《西狭颂》仍在原址上,且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无一破损,被世人推崇为三宝之冠。

从成县县城出发向西大约 13 公里,便进入鱼窍峡。峡谷两岸山峦逶迤,一溪流水由东向西奔腾而出。两座高大山体紧扼谷口,一为天寿山,一为天井山。在天井山北麓崖壁的转角处,有一处山崖上壁与两侧突出,中间形成一片天然的凹面。《西狭颂》就镌刻在这块山崖上,下临深潭,传说古代有黄龙自潭内飞出,人称“黄龙潭”。因此,当地人也将《西狭颂》俗称《黄龙碑》。

《西狭颂》,又称《西峡颂》,全称为《汉武都郡太守汉阳阿阳李翁西狭颂》。其碑额为“惠安西表”四个篆字,所以本名应为《惠安西表》。

“惠安西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中国的汉字,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这里的惠,就是惠民的意思;安,即安民;西,指石刻所在地西狭;表,刻石记功,传扬后世。在汉代碑刻中“表”字是一个常用词。

《西狭颂》是被樵夫砍柴时偶然发现的,由于刻石面在一处凹陷的山崖上,避免了阳光的直晒和雨水的冲刷,加之地处偏僻,长期被藤萝遮蔽,下有深不可测的黄龙潭,险峻异常,一般人很难接近,所以才有保存完好、异常珍贵的《西狭颂》摩崖石刻。

《西狭颂》由于历代椎拓较少,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民国《甘肃新通志稿》载:“按此碑在汉碑中剥蚀最少,以临江摩崖,毡捶不易,故较他碑独获保全,宜海内视为珍秘也。”

《西狭颂》刻于东汉建宁四年(171 年),整个摩崖刻石由篆额、刻画题记、颂文和题名四个部分组成。碑高 220 厘米,宽 340 厘米,碑额